

汉语知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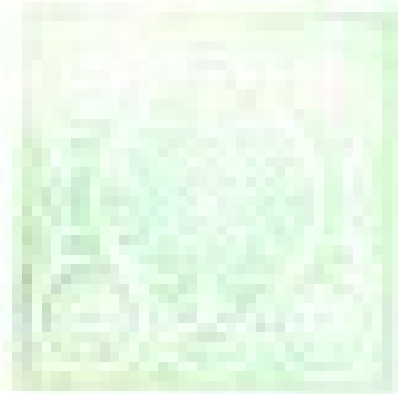


中古音

李新魁

商务印书馆

同治知县品书



中古音

...

...

汉语知识丛书

中古音

李新魁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汉语知识丛书

ZHŌNG Gŭ YĪN

中古音

李·新·魁·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119-6/H·50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2 千

印数 0-2 500 册

印张 5 1/2

定价：1.85 元

目 录

绪言	1
壹 中古时期的共同语语音	4
一 唐、宋时汴、洛一带的“中原雅音”	5
二 由中古时方言的行用反证“中原雅音”的存在	11
三 由“中原雅音”的传播证明它的存在	17
贰 研究中古音的材料依据	24
一 中古时的韵书	24
二 中古时的韵图	45
三 中古时的韵文	56
四 其他的语音资料	59
叁 中古音的声母系统	63
一 声母系统总述	64
二 唇音声母的分化	73
三 舌上音声母的音值	77
四 从、邪是否合一	79
五 庄组与章组声母的分合及其音值	80
六 船、禅相混	83
七 日母的读音	85
八 喻三、喻四不分	86
九 全浊音声母是否消变	87
十 《广韵》中的“重组”问题	93

肆 中古音的韵母系统	110
一 韵母系统总述	110
二 一等韵的归并	125
三 各组二等韵“重韵”的混同	130
四 某些三等韵的合一	134
五 三、四等韵的合流	148
六 开、合口韵的分立	153
七 [ɿ]、[ʊ]韵的产生	155
八 [ie] 韵的出现	159
九 入声韵的消变	160
伍 中古音的声调系统	163
一 阴阳分野与浊上变去	163
二 入声的存亡	166

绪 言

中古音是汉语语音史的一部分，是汉语语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所谓“中古音”，是指从隋经唐至宋这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音。我们知道，隋朝享祚不永，而唐和宋却保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也可以说，中古汉语的语音，主要就是指唐、宋时期的语音。从隋至宋，大约包括从公元 581 年至 1278 年共 697 年的时间。这段时间的汉语语音，承接着更古时期的语音发展而来。而在中古时期，汉语的语音又经历着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已经大体上奠定了近代汉语语音的基础。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古音是汉语语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上古音、近古音（魏晋时期的语音）和近代音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汉语语音发展的一个转轴。

隋唐之际，我国黄河流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事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唐朝统一了中国之后，政治上也呈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对汉语共同语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都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研究中古汉语的语音状况，首先就是要研究共同语语音的状况。唐宋之际的中古时期，是否有人所说的共同语呢？是否存在一种共同语的标准音——正音呢？这种正音又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依据呢？这些问题，过去在学术界中，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因此，在我们探讨中古音

的语音系统之前，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先作一番探究，在这种探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论述中古音系本身。

另外，过去某些学者在叙述中古汉语的语音时，主要以中古出现的韵书如《切韵》或《广韵》作为依据。我们认为，中古这些韵书的出现，有它们一定的时代背景，有它们的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些韵书所表现的语音系统，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中古汉语共同语语音的实际面貌。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韵书并不是反映一时一地之音。在它们身上，包含有某些古音和方音的成分。既然如此，我们想要探究一个比较真切地反映中古时期汉语共同语语音的音韵系统，就不能专主这些韵书。因此，本书特辟另一专章对研究中古音的材料依据作一个概括的论述，表明我们对《切韵》一系韵书的看法，并介绍某些用来作为研究中古音的其他参证资料，以便读者对我们据以研究中古音的材料有所了解。

在介绍了中古时期汉语共同语语音的状况和研究资料之后，我们进而论述中古语音系统本身。在论述中，我们以中古韵书为重要依据，然后参合其他语音材料来说明中古音系的诸般问题。我们希望描绘出一个比较切合历史真实的中古音系统。当然，中古音所包容的历史年代长达七百年之久，在这七百年中间，语音不可能没有发展和变化。因此，对中古音的描述，也不是列出一个声、韵、调系统便可完事。当然也不可能分为更细碎的历史段落，列出更多个反映不同时期语音的音韵系统。我们只能概括出一个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中古音面貌及发展大势的语音系统。至于此一系统之中各种音素

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我们只能在各个具体的问题中加以说明。我们所拟定的中古音系，大体上是代表唐宋之交（或者说是北宋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语音概貌。在此之前或之后的发展变化，就只能在各项说明中加以阐述了。

总之，本书的叙述反映我们对语音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探索，材料有一点是新的，方法有一点是新的，结论有一点是新的。这一切，都表明本书的写作仅仅是属于一种新的探索。至于这种探索，是否能够为人们所接受，是否能达到我们所说的描述一个比较能够反映历史真实的中古音面貌的目的，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自信。我们期望着这种探索能够不断进行下去，深入下去，使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能够创造出更多一点儿成绩。

壹 中古时期的共同语语音

汉语在很早的年代，便有共同语存在。周秦时代，在汉族人民聚居的黄河流域中心地区，就有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出现。《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对这个“雅言”解释说：“孔曰‘雅言’，正言也。”这个雅言就是在《礼记·王制》所说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的情况下用来彼此交际的共同语。这个共同语就是春秋战国各诸侯国朝聘会盟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当时一般读书识字所用的书面共同语。春秋末期，孔子诵读诗书、周游列国所操的就是这个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刘台拱《论语骈枝》说：“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这个共同语的语音，是以什么地方的语音为主要依据呢？一般认为是以周代的首都之音为依据。我们知道，周代之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以王室和它的都邑为中心的社会，这个都邑，商人称为“天邑商”，起先是在亳（今河南商丘北41里），后来经过六次迁徙，最终定都于殷墟（即现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在周克商之后，周族的文化及语言与商族发生了融合。根据历史的记载，周公旦东征胜利时，便把殷的“顽民”迁到“成周”（洛阳），而且还把一部分殷人分配给封到鲁的伯禽（周公的儿子）和封到殷旧地的康叔（周公的同母弟）。总之，商与周两族的居民发生了大融合。特

别是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原来商、周两族的文化和语言进一步交融。东周以降，洛阳这个地方在以后的几百年中一直成为周代政治、文化的中心，它的语言成为诸侯之间朝聘会盟所使用的语言，它的语音成为共同语语音的代表。马瀛《国学概说》说：“周自春秋以前，列国承认周室为共主，故各国皆以雅言为当时之标准音。”罗庸《战后的国语与国文》（载《国文月刊》第四十期）一文也说：“我们推想西周时代，必曾经努力做过一番国语统一运动。主持这个运动的，是太师、国史和列国聘问的行人之官。”他又说：“西周的封建，以一个诸侯共主要统辖一个异言异俗的广大地区，其势非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不可。照章太炎先生的意见，这共同的语言便是《论语》上‘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雅言’。”总之，先秦时代，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洛阳一带出现以王室为中心的语言为代表的共同语，大概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 唐、宋时汴、洛一带的“中原雅音”

从先秦发展到隋唐宋的中古时代，历代王朝的首都虽然时有转移，但在洛阳定都的皇朝却很多。远的不说，比较接近中古时期的北魏和隋朝，都以洛阳为都。南北朝对峙之时，南方的金陵虽也曾作为都城，而且它的语音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据学者们的研究，认为金陵地区士大夫阶层所操的雅语，就是从洛阳传入的。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隋炀帝时，也以洛阳为都，“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这个“东京”就是洛阳。由于百姓的大规模迁徙，居民来源复杂，这就使共同

语的运用更形必要。

隋代之时，共同语使用的情况不可尽知其详，但隋时的文献资料，有时也透露出一点当时共同语标准音（或称为“正音”）确实存在的消息。例如隋朝人曹宪为《博雅》（即《广雅》）作音，他于此书卷五“释言”“踣”字下注云：“浦迷（反），口音，普计（反），正音。”这个注文的意思是说，踣字在当时的口音中读为浦迷反的音，属齐韵平声，而在当时的“正音”中则读为普计反的音，属霁韵去声。现见《广韵》将此字收入霁韵之内，匹诣切，注明“见《管子》。”这说明《广韵》收的是隋时的“正音”。这个“正音”显然就是指我们所说的标准音。足证隋代这种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存在的。曹氏又于卷五“𡵓”字下注曰：“正音竹涉反”；于“钻”（案《广雅疏证》谓此字为𡵓字之或体）下也注曰：“正音巨炎反”；于“𡵓”字下注云：“靡宜（反），口音无悲（反）”；于“尿”字下注云：“勑吏（反），口音緇”；于“𡵓”字下注云：“止善反，口音锄限（反）”；于“𡵓”字下注云：“所佳反，口音死”，可见所注与口音相对的，则是“正音”。也就是当时的共同语标准音。

和隋朝差不多同时的陆德明（原仕陈，后为隋炀帝秘书学士、国子助教），他撰写了《经典释文》一书。他广集南北朝以来的诸家音切，为传世的“经典”注音。他在广引各家音切之时，一般先注一个不加注家名姓的音，这个音有人认为用的就是当时普遍流行的标准音。陆氏在此书的“条例”中说：“文字音训，今古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读，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遵承，标之于首。”由此可知，陆氏“标之于首”的音切，就是他经过“斟酌”之

后所采用的“典籍常用，合理合时”的标准读音。所谓“典籍常用”，就是长期流行、流传广泛的典籍的惯常读音，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学语言标准音”。这种“典籍常用”的音读，是由南北朝以来承用的读书音系统，它有典范性，也有权威性，所以陆氏用它“标之于首”，这也就是曹宪所说的“正音”一类的东西。所谓“合理合时”，是说这种音读，不是某一个人的私家传授或自我自意，而是得到当时社会上的学者所共同赞成和采用的。这也表明其标准音性质。由陆氏的说法和做法看来，当时存在一套“合理合时”的标准音，是无庸置疑的。

隋代之前使用的“正音”或标准音，有人认为就是洛阳音（其读音称为“洛生咏”）。到了隋朝以后的中古时期，洛阳一带的语音继承了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继续发展着。人们心目中的“正音”或“雅音”也是以洛阳音为代表。北齐的颜之推（参预中古著名韵书《切韵》纲领讨论的重要人物之一）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至邺以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词，少为切正。”颜氏又说：“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从这两段话可以推知，当时的雅言、正音必甚为流行，才有所谓“切正”与“不正”的评论产生。如果没有据以为正的“正言”、“正音”，也就无法评判正与不正。因此，颜氏心目中必定有一个正音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地方的语音呢？他在《音辞篇》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兹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推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由此可知，洛阳与金陵的语音，就是颜氏心目中的

标准音。

入唐以后，洛阳仍然保持着中原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所以唐人李涪的《刊误》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唐朝之时，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比较发达，出现了“盛唐之世”。唐时虽以长安为都，但洛阳一带并不冷落。原因是唐初时以洛阳为“神都”，唐高宗、武后、中宗、玄宗、昭宗数朝都曾以洛阳为都，称之为“东都”。许多文人学士也多会聚于洛阳。洛阳一带保持着繁荣的文化事业和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因此，它的语音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一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有人认为，唐时的长安音，与洛阳音是比较接近的。

唐朝盛行科举，诗歌韵文十分发达。科举考试的开展，促使共同语有进一步的推广。而由于科场赋诗作文，要求有共同的语音规范，一般必需按照礼部所规定的统一的韵书押韵，这就大大推动了士人们对由韵书所反映的标准音的研习。适应这种科举考试的需要，唐时出现了许多韵书，如《唐韵》、《切韵》（李舟作）、《韵英》、《韵詮》等。另外，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注释经籍的书和其他的义书、音书、字书，如颜师古的《匡俗正谬》、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慧琳也有《一切经音义》、李邕的《唐韵要略》、颜真卿的《韵海镜源》、何超的《晋书音义》、张戢的《文字释要》和《考声切韵》、张参的《五经文字》、唐元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等，这些书籍对于共同语词汇和语音的规范化和传播，也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书继承《切韵》、《唐韵》推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一直承用的共同语标准音——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语音。

到了宋代，河南的汴梁（开封）成为都城，它在地理位置上与洛阳相当接近，在语音上也承用以洛阳音为代表的标准音。因此，有宋一代，以洛阳、开封一带的语音为基础，继续成为标准音，一般称之为“中原雅音”。

明人吕坤在《交泰韵》中说：“中原当南北之间，际清浊之会，故宋制中原雅音，会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谓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为声气之萃。我朝《正韵》，皆取裁焉。周氏德清，高安人也，力诋沈约，极服中原。”吕氏所说的“中原雅音”，并不是说宋代制作了一本名为《中原雅音》的书（明代之际确有一本称为《中原雅音》的书出现），而是说，中原雅音制作、形成于宋代。为什么要取中原之音为“雅音”呢，这是因为“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为声气之萃。”所谓“为声气之萃”，实在就是说它居于共同语的地位。这个以河洛语音为代表的“中原雅音”，既为《洪武正韵》所取裁，又为《中原音韵》的作者周德清所推服，据以为制作《中原音韵》一书的语音依据。他的这种说法，得到明清时代许多学者的赞同。如明人马逢造在乔中和所撰的《元韵谱》上作序曰：“我太祖高皇稽古右文，混一之初，诏词臣编《洪武正韵》，会四方之极，正中原之音。或合或分，各极其妙，诚万世不刊之典。”明代的著名词曲理论家沈宠绥在《度曲须知》中也说：“愚窃谓音声以中原为准，实五方之所恪宗。”清人潘耒在《类音》中也有相似的说法：“或曰：河洛天地之中，雅音声韵之正，”清人周赞的《山门新语》也说：“夫中国车书一统，而音韵必叶中州。”至于吕坤所说的周德清《中原音韵》推服中原雅音的情况，事实也确是如此。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

“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余生当混一之盛时，耻为亡国之呼吸；以中原为则，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编之。”由周氏的叙述可知，这个“中原之音”具有很高的权威地位，虽兴自北方的元朝，其“言语之间”还“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周氏所说的情况是否可靠呢？其他人的说法证明他的话是不错的。如与他差不多同时的虞集，便在《中原音韵》的序言上说：“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有人认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反映的是元代的大都（北京）音，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周氏所说的“中原”，显然是指河南一带。他强调的“中原之音”，就是河南一带的语音。清朴隐子《诗词通韵·序》说：“词严声律，韵必中州，盖河洛当九域之中，其音可通于四方耳。”序中又说：“余究心声韵，远历诸方，考较三十余载，斯知天下固有通音。其能播达九区、象译外国者，实惟中州。”他所说的“中州通音”，指的就是河洛之音。其内涵与周德清《中原音韵》所表现的语音系统实际相同。不单周德清看到元代之时中原音韵流通于四海的情况，元人对此也多有论述。如元范德机《木天禁语》“音节”条说：“马御史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语，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盖中原天地之中，得气之正，声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诗中宜用中原之韵。”他这里所说的“中原之韵”，显然也是指“居天下之中、得气之正”的河洛之音。他的说法，与吕坤的论述意旨相同。元人孔齐《至正直记》也说：“北方声音端正，谓之中原雅音，今汴、洛、中山等处是也。南方风气不同，声音亦

异,至于读书字样皆讹,轻重开合亦不辨,所谓不及中原远矣。此南方之不得其正也。”可见元人心目中的中原雅音,指的就是河南一带的语音。这种中原雅音,在周德清作《中原音韵》之时,已经出现甚久,所以周氏说:“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周氏还在同书中指出:“(元时)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可见这个“中原之音”在元朝的流行,场合已甚为普遍,时间已甚为长久,这说明在元代之前的宋、金时代,中原雅音已经流传久远了。由后人的论述可以证知,这个“中原雅音”在唐宋的中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吕坤所说的“宋制中原雅音”,并非无据。

二 由中古时方言的行用反证 “中原雅音”的存在

宋代之时,一方面是以汴洛之音为代表的“中原雅音”有了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当时的各地方音仍然普遍存在。在宋人的著述中时时提及各地的方音,其中不乏与“正音”并提或加以比较的意味,从这些叙述中也可以反证出当时“中原雅音”的存在。正是由于方音的普遍使用,也就更加促进作为彼此交际工具的共同语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

宋时,相对于中原雅音,其他各地的方音,不是称为北音、西音、东音、南音,就是称为传统的方言的名称如吴音、楚音、闽音等。这些方音均与中原雅音有所不同。在宋朝的官方交际活动中,一般都使用“正音”、“雅音”,但有时候,由于使用了